

专题：特朗普的美国与未来国际秩序

2016年美国大选与选后美国政治走向

刁大明

内容提要：2016年美国大选是一场以民怨情绪、“反建制派”倾向，以及社交媒体广泛介入为特定趋势的开放式选举。显而易见，唐纳德·特朗普及共和党人成功地迎合了本次选举的总体趋势；希拉里·克林顿及民主党人失去了蓝领中下层的支持。当选后的特朗普将面临兑现民意诉求的极大挑战，府会关系与决策核心圈生态将塑造特朗普政府的内外政策走向。这场大选意味着美国两党政治的新一轮重组进程，美国政治也进入了历史周期更迭的新阶段。目前，政党政治以“党内政治”即民主、共和两党的党内整合作为优先主题，长期而言正在进行着以政党重组与区域变动为体现的周期更迭。新政治周期的调整是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面对的经济发展与族裔结构等新挑战的必然回应，而特朗普的当选及其带来的不确定性正是新周期更迭这一时代特征的集中体现。

关键词：2016年美国大选 特朗普 政党重组 政治周期

2016年美国大选标志着美国政治的新一轮重大调整。由于时任总统奥巴马因任期限制无法谋求连任，这次大选势必要选出一位新人出任下一任美国总统。同时，美国国会的34位参议员、全部435位众议员及6位没有投票权的国会众议院代表要进行改选；12个州的州长、美属萨摩亚及波多黎各等两个属地的行政长官及多个城市政府要举行换届。就大选结果而言，共和党取得了大幅度的胜利：共和党在国会两院的席位虽缩水，但延续了占据多数地位的优势；共和党党籍的

1 刁大明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本文为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2016年美国大选与美国政治前景”研究项目报告《特朗普时代：2016年大选与美国政治、外交走向》全文节选版。研究报告相关内容已分别以学术论文形式公开发表于《美国研究》2016年第6期、《外交评论》2017年第3期以及《美国问题研究》2017年第2期。本文由刁大明执笔。

州长数量也从选前的31位增至33位；更为重要的是，70岁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出人意料地以306比232的选举人团票优势战胜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入主白宫。¹

一场被认为是两位“最不受欢迎”的候选人之间的白宫之争，却以所谓“反建制派”（anti-establishment）候选人击败“建制派”候选人的结果落幕，这一选举结果对观察、研究美国政治的现状与前景提出了新的和更高的要求。这是一场怎样的选举？特朗普及共和党为何能够取得胜利？特朗普上台后将面对何种政治局面？2016年大选对美国政治而言又将意味着什么？本部分就尝试基于选后掌握的有限信息对相关问题展开初步探讨。

一、2016年美国大选的环境与趋势

既定且难以改变的环境一定程度上约束并驱动着总统竞选所有参与者的策略制定。² 环境或特定趋势塑造着竞选议题，甚至决定着选举政治的最终走向。对于2016年大选而言，选举本身的开放式定位、美国民众特别是白人群体的民怨情绪、反对精英政治的“反建制派”趋势，以及社交媒体所发挥的个性化效果，都在潜移默化地左右着本次选举的基调与态势。

首先，开放式选举决定了本次大选的基本特点。所谓“开放式”选举是指总统大选中在任总统不能或不愿谋求连任、副总统也未参选，从而使大选完全向两党各参选人开放的选举。这种形式的选举提升了总统大选的竞争性与不确定性。自民主、共和两党首次同时参与总统大选的1856年以来，共有12次开放式选举，21世纪以来已出现了两次（2008年和2016年）。同时，美国在过去24年中经历了三位连任总统、两次政党轮替的“政治钟摆”过程，这凸显了美国总统政治及其政策议程进入了延续性相对较低、变动性相对较大的历史阶段。

一方面，民主党面对求变的民意。在开放式选举中某一政党得以延续对白宫控制的前一次情况还是在1928年，即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接替同为共和党的加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且是以全美经济繁荣和民主党分裂为重要背景的。³ 时隔88年之后，民主党治下的美国经济并不令选民满意，民主党继续控制白宫所面临的民意压力相对较大；另一方面，共和党面对整合的难题。在同时容纳17位主流参选人竞争的历史性规模的初选中，共和党陷入了分

1 “2016 Election Results”, *Politico*, available at: <http://www.politico.com/2016-election/results/map/president>, 2017年1月30日访问。

2 Nelson W. Polsby, Aaron Wildavsky, Steven E. Schier, and David A. Hopkins, *Presidential Elections: Strategies and Structures of American Politics*, 14th ed.,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2016, p. 1.

3 “United States Presidential Election, 1928”, *Wikipedia*, available a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nited_States_presidential_election_1928, 2017年1月30日访问。

裂状态，杰布·布什（Jeb Bush）、约翰·卡西奇（John Kasich）、克里斯·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等参选人之间的激烈竞争无法整合“建制派”力量，最终为特朗普的异军突起创造了机会。¹

其次，白人中下层群体的民怨情绪营造了本次选举的民意环境。2016年大选充斥着美国民众在经济与就业、社会议题与族裔关系，以及国际地位与安全环境等多层次议题上长期积累的不安、不满、愤怒甚至是恐惧情绪。这种谋求变革的民怨是以全球化作为主要背景的，并表现为资本流动所导致的美国国内实体经济空心化与移民流动导致的美国国内人口结构多元化等两个核心矛盾点。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的缓慢复苏令民众“无感”而“无奈”，²改善经济与就业状况一直是美国公众最为关注的首要议题。³一方面，就业增长更多地来自低端服务业而非实体经济。据统计，2014年美国就业岗位中的80.1%是由服务业提供的，而工业实体产业与农业只分别创造了15.1%和1.5%的就业岗位。⁴美国劳动者特别是蓝领工人的就业在水平、质量和稳定性上都难言理想。更糟的是，由于专业程度低而具有极强的可替代性与流动性，蓝领中下层白人群体极易因被新移民、少数族裔等更低成本的劳动力群体取代而再度失业；另一方面，美国中产阶级的规模呈现出空前的萎缩态势。根据2015年年初的统计，中产阶级占人口的比例已从20世纪70年代的61%降至49.89%的历史低点。⁵与之相伴的是，社会财富继续向富裕的高收入阶层快速聚集，令处于社会大多数的中产阶级与低收入阶层普遍存在着强烈的“被剥夺感”。

在经济与就业议题上受累的同时，白人群体还面对着人口结构多元化带来的认同危机。一方面，据保守预计，由于新移民的激增和少数族裔的高生育率，美

1 刁大明：《“特朗普现象”探析》，《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4期，第31—39页。

2 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从2009年的-2.8%恢复到2015年的2.4%，处于西方世界的领先水平；2015年年底，失业率已降至5.0%，2016年11月更是实现了失业率为4.6%的水平，回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状态；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14年和2015年更是实现了2.7%和3.4%的增长。分别参见：“Annual Growth of the Re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1990 to 2015”，Statista, available at: <http://www.statista.com/statistics/188165/annual-gdp-growth-of-the-united-states-since-1990/>, 2017年2月1日访问；以及“Labor Force Statistics from the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available at: <http://data.bls.gov/timeseries/LNS14000000>. “Personal Income and Outlays: January 2016”,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Feb. 2016, available at: <http://www.bea.gov/newsreleases/national/pi/pinewsrelease.htm>, 2017年2月1日访问。

3 “Problems and Priorities”, *The Polling Report*, available at: <http://www.pollingreport.com/prioriti.htm>, 2017年2月1日访问。

4 “Employment by Major Industry Sector”,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http://www.bls.gov/emp/ep_table_201.htm, 2017年2月1日访问。

5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 Is Losing Ground”, *Pew Research Center*, Dec. 9, 2015, available at: <http://www.pewsocialtrends.org/2015/12/09/the-american-middle-class-is-losing-ground/>, 2017年2月1日访问。

国可能在50年后成为“无多数族裔人口结构”的国家。¹ 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我们是谁”的疑问已萦绕在所有美国人民心中，构成了主导地位岌岌可危的白人群体持续焦虑的根源之一，进而从历史中走来的种族与族裔矛盾再度凸显出来。另一方面，经济与就业改善的难遂人愿、中东地区极端伊斯兰思想的抬头，以及美国国内枪支泛滥的顽疾，共同将族裔矛盾抛入了恶性循环之中。低水平的就业加剧了白人蓝领中下层与少数族裔、新移民之间的生存竞争，恶化了少数族裔、新移民的经济处境与社会状况；而这些无法实现所谓“美国梦”的少数族裔、新移民群体又极有可能受到伊斯兰极端思想的驱使，在控枪措施不力的状况下酿成诸多恶性事件，从而再次激化了白人与少数族裔、新移民之间的敌对情绪。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2015年加州圣巴纳迪诺枪击事件、2016年佛罗里达州奥兰多酒吧枪击案等类似事件的实施者皆为“梦断”美国的少数族裔新移民。根据调查，有大约四成美国民众同意将非法的“无证移民”（undocumented immigrant）驱逐出境；在叙利亚局势日益恶化之后，超过一半的美国公众都反对美国接受叙利亚的难民。²

2016年大选中的民怨情绪可被视为是2008年民心求变的累积与延续。奥巴马在八年执政期间虽然试图尽力兑现竞选承诺，但并未令许多民众满意。他本人的少数族裔身份背景，以及民主党针对少数族裔、新移民的政策倾向，反而加剧了白人中下层群体内心的不满与愤怒。

再次，“反建制派”倾向构成了本次大选的政治风向。所谓“反建制派”倾向即对具有专业经验、政策积累以及社会资源的政治精英的反感与不信任，希望与政治精英无关的“圈外人”改变现行政治规则与政策议程。从历史上看，美国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传统在政治上就表现为“反建制派”倾向。而在现实中，根据2008年以来的民调持续显示，至少七成美国民众对国家发展方向并不满意，进而对政治精英充满了不信任。³

金融危机以来，“反建制派”倾向在共和党中尤为明显，2009年兴起、2010年逐步进入政治运作的“茶党”（Tea Party）势力强烈抵制华盛顿精英，并快速催生了数量可观的“反建制派”政治人物出任国会议员等选任职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为，时任国会众议院多数党（共和党）领袖埃里克·坎托（Eric

1 白人的比例将在50年之后降至50%以下，拉美裔将上升至24%，14%的亚裔可能超过非洲裔的13%。
参见：D'Vera Cohn, "Future Immigration will Change the Face of America by 2065", *Pew Research Center*, Oct. 5, 2015, available at: <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5/10/05/future-immigration-will-change-the-face-of-america-by-2065/>, 2017年2月1日访问。

2 "Immigration", *The Polling Report*, available at: <http://www.pollingreport.com/immigration.htm>, 2017年2月1日访问。

3 "Satisfac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Gallup*, available at: <http://www.gallup.com/poll/1669/general-mood-country.aspx>, 2017年2月1日访问。

Cantor) 在2014年的中期选举预选中意外地被“茶党”势力支持的“圈外人”击败, 使他成为1899年设置多数党领袖职位以来首位在预选中落败的在任者。¹ 在本次大选的共和党预选中, 除特朗普外, 也有如脑外科医生本·卡森(Ben Carson)、女商人卡莉·菲奥里纳(Carly Fiorina)等多位毫无政治经验的“反建制派”参选。与共和党相同, “反建制派”倾向也贯穿于民主党党内竞争的始终。在预选阶段, “建制派”希拉里·克林顿遭遇了“反建制派”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强力挑战, 足以说明民主党内部反对传统政治精英的呼声在上升。

最后, 社交媒体的个性化动员改变了本次大选的竞选生态。大众传媒的变革既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产品, 也是理解美国政治进程的钥匙。² 如果说2004年霍华德·迪安(Howard Dean)的总统预选标志着美国竞选政治步入了互联网时代, 那么2016年大选无疑是社交媒体首次全面介入竞选活动的一场选举。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 在18岁到29岁的受访者中, 有35%的人将社交媒体视为获取大选信息的最重要来源, 排名第二位的是新闻网站和手机应用(18%); 而在30岁到49岁的受访者中, 虽然21%的人将电视视为最重要来源, 但更愿意借助新闻网站和社交媒体的人也分别有19%和15%, 总数同样多于传统媒体。³

从目前来看, 互联网特别是社交媒体在竞选中的广泛应用对政治参与的影响程度仍不确定,⁴ 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确已改变了美国竞选政治的运作方式。其一, 研究证明, 互联网并未为选民提供广泛而公开的信息, 反而会促使选民只关注那些他们支持的候选人的信息、只与那些有共同倾向者建立联系, 从而固化甚至极端化了选民的政治倾向。⁵ 其二, 传统媒体在议程设置上要么被政治精英操控, 要么充斥着政治人物的负面信息, 因而逐渐引发公众的反感,⁶ 社交网络等新媒体则取而代之, 甚至为无法得到主流媒体支持的“反建制派”政治人物提供了传播与动员的主要渠道。按照另一位参加竞选的民主党人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选后的描述, 其“推特”(Twitter)和“脸谱”(Facebook)

1 Molly Ball, "Eric Cantor's Loss: A Stunning Upset", *The Atlantic*, June 10,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14/06/eric-cantor-loses-in-stunning-upset/372550/>, 2017年2月1日访问。

2 [美] W. 兰斯·班尼特:《新闻: 政治的幻象(第5版)》, 杨晓红、王家全译,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5年版, 第15页。

3 "The 2016 Presidential Campaign: A News Event That's Hard to Miss", *Pew Research Center*, Feb. 4, 2016, available at: <http://www.journalism.org/2016/02/04/the-2016-presidential-campaign-a-news-event-thats-hard-to-miss>, 2017年2月1日访问。

4 Yonghwan Kim, Hsuan-Ting Chen, and Homero Gil de Zuniga, "Stumbling upon News on the Internet: Effects of Incidental News Exposure and Relative Entertainment Use on Political Engagement,"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Vol.29, Issue 6, Nov. 2013, pp.2607-2614.

5 Philip Paolino and Daron R. Shaw, "Can the Internet Help Outsider Candidate Win the Presidential Nomination?" *P.S.*, Vol.36, Issue 2, April 2003, pp.193-197.

6 [美] W. 兰斯·班尼特:《新闻: 政治的幻象(第5版)》, 第95页。

账户在竞选中分别增加了300万和500万个关注者，“我们通过对社交媒体潜力的挖掘为‘进步主义政治’著书立说了”。¹ 其三，互联网与社交媒体重构了竞选的募款模式，社交媒体构建起双向互动，实现了与动员反向的捐款。² 桑德斯在初选中通过互联网得到了250万个捐款人的800万笔捐款，³ 而他募集到的2.28亿美元个人捐款中的59%为小额款项，其中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贡献颇多。⁴

塑造2016年美国大选走向的四个因素中，开放式选举结构是独特因素。

需要指出的是，在共同塑造2016年大选走向的上述四个因素中，只有开放式选举结构的影响力仅限于本次选举阶段，其他三个如民怨情绪、“反建制派”倾向，以及社交媒体对政治的介入等趋势，正在继续左右美国政治未来的发展路径与样貌。

二、2016年美国大选结果的评析

2016年美国大选以共和党在白宫、国会和各州不同层次的胜利而落下帷幕。比较而言，共和党在国会两院继续维持多数的结果在选前得到了较多的预见：共和党在第114届国会众议院中占据的59席多数是1929年第71届国会以来该党占据的最大规模优势，在大选年的国会选举中被翻盘的难度略大；共和党在国会参议院选举中较为关键的席位如宾夕法尼亚、威斯康星、北卡罗来纳、新罕布什尔、伊利诺伊等州均为在任者谋求连任，整体上胜算也略大。与国会两院选情相对稳定不同，总统大选的结果超出了多数人的普遍预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不但同时失去了佛罗里达、俄亥俄、艾奥瓦等关键摇摆州，而且还在此前被预期选情稳健的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及威斯康星等所谓“锈蚀带”（Rust Belt）⁵ 各州以微弱劣势不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虽然以48.2%比46.3%领先特朗普将近257万张选民票，但希拉里·克林顿仍以232比306的选举人团票差距输掉了选举，这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五次发生选民票与选举人团票相悖的选举结果。⁶ 面对如此始料未及的大选结果，美国政治的历史周期、特朗普对竞选的准确定位，以及希拉里作为候选人的天然欠缺等因素或可提供一些初步的解释视角。

1 Bernie Sanders, *Our Revolution*, New York: Thomas Dunne Books, 2016, p.100.

2 Matthew Hindman, “The Real Lessons of Howard Dean: Reflections on the First Digital Campaign,”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3, No. 1, March 2005, pp.121-128.

3 Bernie Sanders, *Our Revolution*, New York: Thomas Dunne Books, 2016, p.100.

4 参见 OpenSecrets.org 关于桑德斯竞选经费的相关网页：<https://www.opensecrets.org/pres16/candidate.php?id=N00000528>。

5 “锈蚀带”是指传统制造业广泛分布的美国大湖区与中西部各州。该区域是美国经济衰退、人口流失、城市衰败最为明显的区域之一，也是美国蓝领中下层群体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

6 “Presidential Results”, *CNN Politics*, Dec. 4, 2016, available at: <http://www.cnn.com/election/results/president>, 2017年2月1日访问。

首先，美国政治的历史周期正在转向共和党。关于美国历史周期的讨论以美国历史学家施莱辛格父子的研究流传最广。基于老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Sr.）关于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交替主导且平均11.5年更迭一次的论断，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提出了关于美国联邦政府的国内政策在“公共利益”（public purpose）与“私人利益”（private interest）之间摇摆的历史周期理论，每次回摆大概需要25到30年。¹ 通常而言，“公共利益”导向的选举即偏自由派主张的得势，比如1901年的老罗斯福、20世纪30年代的小罗斯福和20世纪60年代的肯尼迪政府；而“私人利益”主导的选举开启的则是保守主义思潮笼罩的政府，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哈丁—柯立芝—胡佛”政府和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政府。² 基于小施莱辛格的理论，美国立国以来的52次大选分为20次“公共利益”主导及32次“私人利益”主导，而至少自1856年以来，“公共利益”或“私人利益”导向基本上是分别直接与民主党或共和党相对应的。³

美国目前所处的历史周期基本上是“公共利益”导向的，发端于1992年当选的克林顿政府。即便在2001年到2008年是共和党人小布什执政，但他在国内政策议题上的某些做法还是体现了“公共利益”倾向，体现在他宣称的“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的社会政策上，比如将部分处方药纳入医疗保险范围，以及“一个孩子都不能少”（No Child Left Behind）的教育改革等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在2009年以来奥巴马政府推进全民医保、向富人征税、移民改革等“公共利益”导向的自由派政策的同时，一系列要求“个人利益”的政治浪潮也此起彼伏，比如主张有限政府、反对政治精英的“茶党”运动，以及在2016年大选中得以充分体现的中下层白人群体的民怨情绪。换言之，2016年大选或2020年大选正处于从“公共利益”回摆到“私人利益”即从民主党转向共和党的周期调整点上，而特朗普及共和党的竞选成功地顺应了这一周期趋势。

具体观察，本次大选初步具有了历史周期摆动所带来的“政党重组”（party realignment）与“区域主义”（sectionalism）整合的某些端倪。从“政党重组”角度而言，虽然仍不能确定2016年大选是一次促使两党选民基本盘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性选举”，但从选举结果看，特朗普扩展了共和党在中下层特别是蓝领群体中的支持度。从投票站的出口民调数据观察，对比2012年大选，在本次选举中，共和党增长最多与民主党减少最多的同步变化群体包括了“中学教育及以下者”（共和党增加16%、民主党减少19%）、“家庭年收入三万美元以下者”

1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 Boston: Mariner Books, 1999, p.31.

2 谢韬：《从大选看美国的历史周期、政党重组和区域主义》，《美国研究》，2012年第4期，第30—45页。

3 Stewart J.H. McCann, “Schlesinger’s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 and Presidential Candidate Age (1789-1992): When Younger Is Better”, *Political Psychology*, Nov. 2001, Vol.27, No.11, pp.1429-1439.

(共和党增加6%，民主党减少10%)，以及“非婚男性”(共和党增加5%、民主党减少10%)，这些群体的变化直接反映了受教育程度偏低的蓝领中下层在本次选举中支持特朗普而非希拉里的态势。¹而在“区域整合”意义上，决定最终选举结果的宾夕法尼亚、威斯康星和密歇根三州正是蓝领中下层选民聚集的“锈蚀带”地区，而“锈蚀带”地区逐渐从民主党基本盘转入共和党基本盘的态势事实上自金融危机以来就已悄然开启。与2008年大选相比，奥巴马在2012年不但输掉了位于“锈蚀带”的印第安纳州，而且其胜出比例缩水幅度最大的五个州中除佛罗里达(31%)、内华达(53%)等摇摆州外，就是“锈蚀带”的威斯康星(49%)、宾夕法尼亚(52%)和密歇根(57%)三州。²在2016年大选中，希拉里只是延续了奥巴马任内民主党在“锈蚀带”地区逐渐失势的大趋势，该地区的区域整合直接将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送入了白宫。

其次，特朗普实施了驾驭2016年大选态势的精准竞选。客观而言，2016年大选中的开放式选举结构、求变民怨情绪、“反建制派”风向和社交媒体动员等趋势都对传统政治精英不利，反而有助于特朗普的竞选；而特朗普则充分利用了本次大选的特定环境与趋势，实现了精准的动员与竞选。

其一，特朗普有效地迎合了以中下层白人为代表的民怨情绪。在其2015年出版的竞选书《跛足美国：如何让美国再强大起来》(*Crippled America: How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开篇，特朗普就将封面选择其愤怒的肖像照解释为因为美国民众如今也正在怀有同样的不安、焦躁、愤怒，甚至是恐惧。³面对全球化冲击下的民怨情绪，与桑德斯的“平民主义”方案不同，特朗普始终强调“美国优先”，推崇“本土主义”(nativism)的解决方案。具体而言，特朗普将目前美国所有的问题都定义为是“非美国”或者“非本土”的，占主导地位的白人群体并没有错，而是外部世界的“他者”或者移民的过错，因而要阻断这些“非本土”因素的负面牵扯或介入。在众多政策议程中，特朗普在贸易与移民问题上颇为极端，在竞选中多次提出以反对自由贸易、对相关国家课以重税等政策强行实现制造业回流；以在美墨边境筑墙、全面禁止穆斯林入境、全面驱逐“无证移民”等政策捍卫白人权益。在对外政策方面，特朗普并不赞同美国维持与其他国

1 依照公开出口民调的数据计算而成。资料参见：“Exit Polls”，*CNN Politics*, Nov. 23, 2016, available at: <http://www.cnn.com/election/results/exit-polls/national/president>, 2017年2月10日访问。

2 依据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公布的2008年及2012年总统大选各候选人在各州得票数字记录计算而成。资料参见：“Federal Elections 2008: Election Results for the U.S. President, the U.S. Senate and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July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fec.gov/pubrec/fe2008/federalections2008.pdf>, 2017年2月10日访问；以及“2012 Election Results: Official Vote Totals by States,”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available at: <http://www.fec.gov/pubrec/fe2012/tables2012.pdf>, 2017年2月10日访问。

3 Donald J. Trump, *Crippled America: How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New York: Threshold Editions, 2015, p.iv.

家的盟友关系，认为应该专注于应对美国的“真正威胁”。¹

特朗普将民怨引向“非本土”因素的竞选操作在当今美国不乏市场。通常而言，特朗普的支持者被认为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男性，即那些在全球化冲击下低水平就业且要养家糊口的群体。但随着选举的逐步推进，特朗普的支持群体呈现出扩大态势：受教育程度较高者、传统经济（农业、建筑业、制造业和贸易）的从业者、基督教福音派，以及更为广泛的美国本土出生者，甚至在获得合法身份的新移民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特朗普的支持者。²换言之，不同阶层与群体的美国人都存在不满与怨气，而特朗普的“本土主义”解释可以令他们接受。也正是在这种状况下，美国社会中出现了实际支持特朗普的所谓“沉默的选民”，而且这些人在接受民调问答时可能出于对“政治正确”的考虑而隐瞒自身真实的意图，从而导致了特朗普在民调中被低估现象的出现。事实上，从出口民调来看，相对于2012年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的表现，特朗普在非洲裔、拉美裔、亚裔等群体中的支持率均有所成长。³更有研究发现，在从中国、墨西哥等国竞争性进口增长的美国各县中，特朗普获得的支持率都超过了这些县过去20年对共和党支持的平均水平。⁴

其二，特朗普充分地迎合了“反建制派”的政治审美。相对于杰布·布什等所代表的“建制派”甚至“家族政治”，特朗普等“反建制派”人选更能迎合当前美国民众普遍对华盛顿精英、极化政治的不满，以及希望改变传统驴象党争的诉求。特别是在对奥巴马无法满足民意诉求的失望之下，民众颇有“赌性”地期待一位距离传统政治更远的“反建制派”参选人可以实现某些切实的改变。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这种排外甚至颇有“种族歧视”意味的言论看似“政治不正确”，却被另外一种“政治正确”保护着，即反对或批评特朗普就是代表“建制派”政治精英、就是“反对变革的民意”。

其三，特朗普知名度高，操纵媒体的技巧娴熟，善于开展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竞选。虽为富商，但特朗普多年来始终活跃于美国的各类传媒上，在传播意义上具有“网红”特质。特朗普“跨界参选”本身就是新闻，而他在竞选过程中“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言论表达，也时刻为美国媒体制造着新闻话题，客观上抬升了特朗普竞选的曝光度。2015年8月3日，共和党总统初选的首场电视辩论，就因

1 Donald J. Trump, op.cit., pp.33-35.

2 Neil Irwin and Josh Katz, “The Geography of Trumpism”,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2, 2016, available at: <http://www.nytimes.com/2016/03/13/upshot/the-geography-of-trumpism.html>, 2017年2月10日访问。

3 “Exit Polls”, *CNN Politics*, Nov. 23, 2016, available at: <http://www.cnn.com/election/results/exit-polls/national/president>, 2017年2月10日访问。

4 Andrea Cerrato, Francesco Ruggieri and Federico Maria Ferrara, “Trump Won in Counties that Lost Jobs to China and Mexico”, *The Washington Post*, Dec. 2, 2016, available a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monkey-cage/wp/2016/12/02/trump-won-where-import-shocks-from-china-and-mexico-were-strongest/?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utm_term=.4b25ea3e5798&wpisrc=nl_cage&wpmm=1, 2017年2月1日访问。

为特朗普的参与而吸引了2400万观众，创造了非体育赛事类节目的收视纪录。¹更为重要的是，特朗普通过社交网络实时向关注者发送信息，表达着不同于传统政治人物的极端言论和政策立场，这种通过社交媒体实现的实时动员，影响甚至主导了传统媒体议程，实现了传统方式无法企及的竞选效果。截至大选投票日，特朗普在“推特”上的关注者超出了希拉里·克林顿400万，同时他也是在“推特”和“脸谱”网站上被提及频率最高的候选人。²

希拉里·克林顿
的政策倾向与个人特
质与2016年大选的
整体趋势不符。

最后，希拉里·克林顿并非适合2016年大选的理想的总统候选人。在选前，无论是在联邦层次的综合民调还是在各州选举人团分布的预估中，希拉里·克林顿都握有更大胜算。最终落败的结果，除了开放式选举的高竞争性、各州选举人团对民意的重塑等因素造成的影响之外，希拉里·克林顿作为总统候选人的政策倾向与个人特质也并不符合2016年大选的整体趋势。

其一，希拉里·克林顿的政策立场无法有效地吸引蓝领中下层群体的支持。长期以来，希拉里·克林顿的政策站位属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民主党内部崛起的“新民主党人”（New Democrats），即在经济财政议题上相对温和，在社会议题上较为自由，支持自由贸易，主张以促进经济增长来实现“就业福利”。³而这种与奥巴马政府支持《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如出一辙的政策倾向无法得到蓝领中下层的拥护。正因为如此，代表民主党党内传统自由派即“进步主义民主党人”（Progressive Democrats）的桑德斯才以改革华尔街、反对自由贸易、促进社会权益平权等主张取得了工会组织以及中下层民众的支持。虽然希拉里·克林顿在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后也有意识地跟进桑德斯的“平民主义”主张、调整自己的政策主张，但仍未扭转民主党在蓝领中下层群体和“锈蚀带”地区支持度降低的整体困境。

其二，希拉里·克林顿的个人特质已不符合民主党的政治生态。从传统上来讲，民主党更易推出相对年轻的“新面孔”竞选包括总统在内的选任公职，民主党的政党生态也更青睐新鲜血液。而在2016年大选中，希拉里·克林顿不但是民主党建立以来最年长的总统候选人，也是长期混迹于政治舞台的“老面孔”。自实施现行初选制度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七次开放式选举的初选中，民主党在前六次都产生了毫无总统选举经验的“新面孔”，只在2016年选择了曾经参与总统初选的“老将”希拉里·克林顿。这一变化严重压低了民主党基本盘选民

1 Lydia Wheeler, "Record Audience Tunes in for GOP Debate", *The Hill*, Aug. 7, 2015, available at: <http://thehill.com/blogs/ballot-box/presidential-races/250549-early-numbers-show-record-audience-for-first-gop-debate>, 2017年2月12日访问。

2 Laeeq Khan, "Trump Won Thanks to Social Media", *The Hill*, Nov. 15, 2016, available at: <http://thehill.com/blogs/pundits-blog/technology/306175-trump-won-thanks-to-social-media>, 2017年2月12日访问。

3 Jon F. Hale, "The Making of the New Democrat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No.110, 1995, pp.208-211.

的参与热情：特朗普的选民票基本保持了2008年麦凯恩和2012年罗姆尼的6000万左右的水平，而民主党的选民票却从2008年的6949万直接缩水了1400万；希拉里·克林顿在非洲裔（88%）、拉美裔（65%）、18岁到25岁的年轻人（54%）群体中的支持率也都明显弱于2012年的奥巴马（93%、71%、60%）。¹ 换言之，拉低投票率的并非特朗普及共和党，而是对希拉里·克林顿热情骤降的民主党选民。

其三，希拉里·克林顿的“建制派”身份激化了本次大选中原本存在的矛盾。因为希拉里与特朗普分获提名，总统大选转变为“建制派”与“反建制派”的正面对决。一方面，希拉里·克林顿充当了美国社会各界“建制派”精英反对特朗普的最佳代言人，导致了传统主流媒体“一边倒”背书的罕见情形，加深了精英群体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裂痕；另一方面，她的“公务私邮”的“邮件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偏袒丑闻、克林顿基金会海外献金，以及“维基揭秘”（WikiLeaks）爆出的一系列负面信息交互叠加作用，固化了希拉里·克林顿所谓“豪车自由派”（limousine liberal）的负面刻板形象，导致她沦为普通选民“反建制派”倾向的众矢之的，甚至在反华盛顿精英、期待切实变革的民众中酿成了不可小觑的“反动派”效果。²

虽然特朗普当选的结果可以得到某种解释，且选民投票率（55.5%）并不低，但是2016年大选仍旧是一场“低质量”的总统选举。其一，两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均未享有多数民意支持。在选举日前夕，特朗普的满意度只维持在三成上下，不满意度可达六成，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满意度也不足四成，不满意度达到五成以上。³ 在竞选期间围绕着两位候选人的争议性议题乃至丑闻也加剧了民众的厌恶情绪，而“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大选显然无法为选民提供有效且优质的解决方案。其二，特朗普的当选是在“双不过半”的前提下实现的。在美国特有的初选制度和各州“胜者全得”的选举人团制度的交互影响下，特朗普在初选和大选的相应范围选民中均未得到简单半数以上的支持，甚至在大选期间还是以“选民票落后、选举人团票反超”的民意劣势当选的。“双不过半”以及“两票倒置”的弱势状态直接约束着特朗普推进内外政策的政治空间。

正是由于总统选举的“低质量”，在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美国民意不但没

1 资料参见：“Exit Polls”，*CNN Politics*, Nov. 23, 2016, available at: <http://www.cnn.com/election/results/exit-polls/national/president>, 2017年2月13日访问。

2 Steve Fraser, “Hillary is Trump’s Dream Opponent: Clinton is Exactly the ‘Limousine Liberal’ his Coalition Distrust the Most”, *Salon*, May 9, 2016, available at: http://www.salon.com/2016/05/08/hillary_is_trumps_dream_opponent_clinton_is_exactly_the_limousine_liberal_his_coalition_distrusts_the_most, 2017年2月15日访问。

3 “Donald Trump: Favorability Ratings”, *Polling Report*, available at: http://www.pollingreport.com/trump_fav.htm, 2017年6月2日访问；以及“Political Figures: Hillary Clinton”, *Polling Report*, available at: <http://www.pollingreport.com/hrc.htm>, 2017年6月2日访问。

有显现出积极调整迹象,反而发生了民怨累积与极化加剧同步恶化的态势。一方面,民意的悲观与不满持续加剧,毫无改观。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在2017年5月公布的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联邦政府的信任度已跌落至20%,即首次同主题民调的195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另一方面,特朗普面临着极化的民调表现:总体满意度历史新低,但共和党阵营却给予坚定支撑。根据盖洛普的每日追踪民调显示,特朗普以满意度与不满意度同为45%的相对低民调就任,其后满意度基本都不及不满意度,甚至在3月26日至28日的民调中出现了满意度为35%、不满意度59%的最差民调表现。¹ 对比而言,奥巴马同期的满意度超过六成,不满意度最高也仅为三成。² 再从总统上任百日民调的历史比较观察,特朗普以41%的满意度刷新了1953年以来最低民调满意度总统的纪录:前9位总统无一在百日执政中民调跌至50%以下。可见,特朗普在总统政治意义上面对着一个历史上最低、最为负面的民意开局。³

三、特朗普总统面临的美国政治前景

2016年美国大选并未宣泄的民怨情绪、社交媒体重塑的政治动员结构、特朗普政府“单边主义”的政策倾向,这些态势相互牵动、交错强化,推动着美国政治重心或主题的新变化。概括而言,当前美国政治的主题,从短期而言是所谓的“党内政治”,而长期主题则是所谓的“周期更迭”。

(一) 短期主题:“党内政治”优先于“两党政治”

2016年美国大选特别是两党初选阶段,极化对峙的民主、共和两党各自内部也较为集中地爆发了不同政治理念或不同派别之间的冲突,比如共和党党内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反建制派”崛起,或者民主党党内“新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与“进步主义民主党人”伯尼·桑德斯的激烈竞争。这种党内分歧并不仅仅是所谓“建制派”与“反建制派”的冲突,更是两党党内各派别在应对美国当前内外挑战时不同路线选择的冲突。值得注意的是,自1856年即如今的民主、共和两党正式介入总统政治以来,两党政治生态大多数情况下表现为“党内合一党

1 “President Trump: Gallup Daily Tracking”, *Polling Report*, available at: http://www.pollingreport.com/djt_job1.htm, 2017年5月11日访问。

2 “President Trump: Gallup Daily Tracking”, *Polling Report*, available at: http://www.pollingreport.com/djt_job1.htm, 2017年5月11日访问; 以及“President Obama: Gallup Daily Tracking: 2009-2012”, *Polling Report*, available at: http://www.pollingreport.com/obama_job1a.htm, 2017年5月11日访问。

3 “Presidential Job Approval Ratings Following the First 100 Days: Eisenhower-Trump”,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available a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data/100days_approval.php, 2017年5月11日访问。

间斗”（即党内团结合作，两党冲突斗争），在较少的状况下也表现为“党内斗—党间合”（即党内存在某种冲突斗争，两党之间存在一定合作空间），比如“南方民主党”现象。而2016年总统选举当中的两党政治生态却显现出所谓“党内斗—党间斗”的罕见组合，如此更为复杂的极化现象也可以被概括为是“碎片极化”的新特征。

“双斗”态势在“特朗普时代”显然得到了延续，但其主要矛盾或侧重点出现调整，即“党间斗”明显弱于“党内斗”。用美国政治的标准衡量，特朗普的当选并不是“高质量”的当选，但共和党的确自1928年以来再一次掌握了对白宫、国会两院多数、50个州州长多数以及可能决定联邦最高法院政治风向权力的全面控制。¹ 即便民主党在国会参议院尚且有权通过“冗长发言”等方式对共和党的政策议程构成某种程度的搁置，但所谓“核选项”（nuclear option）的广泛使用正在极大地蚕食着这种防御性的制衡能力。进而，民主党人只有在批准条约等需要国会参议院三分之二即“超级多数”通过时才能显现对白宫的影响力。正是由于当前两党政治权力的不对称性，两党之间的竞争性与制衡性暂时下降，两党各自党内的矛盾与整合上升为核心主题，即“党内政治”已优先于“两党政治”。

就民主党而言，2016年总统选举的落败加速了党内权力重构。民主党正在经历寻找新路线与新的领导层的整合过程。前文提及的代表民主党角逐佐治亚州国会众议院第6选区席位的乔恩·奥瑟夫刚刚年满30岁，由他参与的这次选举也被认为将是民主党在“千禧年一代”（millennials）群体中动员能力的“压力测试”，并可能成为“千禧年一代”对特朗普内外政策表达不满甚至对其进行象征性“公投”的信号。² 奥瑟夫作为“圈外人”的意外崛起也得到了包括桑德斯、马萨诸塞州国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等颇受欢迎的民主党政治人物的支持，而这些人属于民主党党内较为激进自由派的“进步主义民主党人”。因而，奥瑟夫的竞选前景可能成为观察民主党党内生态的“试金石”。而民主党目前的党内整合效果最早将在2018年中期选举的议题与路线规划乃至2020年大选中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初选中得到印证。

就共和党而言，虽然目前整体上近乎占据了美国政治中的绝对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彻底控制了美国国家议程，反而是同样面对着党内整合的挑战。客观而言，特朗普只是以共和党候选人身份当选，其政策议程原本就需要与共和党主

共和党整体的绝对政治优势并不意味着彻底控制了美国的国家议程。

1 Josh Zeitz, "What Happened the Last Time Republicans had A Majority This Huge?" *Politico*, Nov 15,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4/11/1928-congress-last-time-republicans-had-a-majority-this-huge-112913>, 2017年6月3日访问。

2 Doug Bock Clark, "Jon Ossoff's Race Is The First Real Battle Between Millennials and Trump", *Mother Jones*, April 15, 2017, available at: <http://www.motherjones.com/politics/2017/04/jon-ossoff-race-first-real-battle-millennials-vs-trump-1>, 2017年6月3日访问。

流派协调，又加之其“反建制派”标签也面临着与“建制派”互动的难度。从其执政初期的表现观察，共和党主流或“建制派”的确对特朗普进行着并实现了塑造。这不但表现为特朗普在外交事务上的实际选择较为快速地回归到了共和党传统轨道上来，也体现为特朗普在内政议程上的推进效果：即共和党主流派一贯支持的且特朗普接受的政策或议题往往较为顺利地实现（如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或者去监管、推翻奥巴马能源政策等行政令）或正在推进之中（共和党版本的《美国医保法案》或税改立法），而特朗普个人极端色彩较为明显的、但共和党主流派并未全部接受的政策或议题（如“限入令”或者“边境筑墙”等）都陷入了被搁置甚至失败的状态。换言之，面对这位颇为孤立的“帝王式总统”，共和党主流派虽然无法实现对白宫决策过程的有效控制或沟通、实现“事前制约”，但至少正在通过针对白宫决策产出进行结果导向的“事后制约”。

“党内政治”作为优先主题的状态可能在2018年中期选举后被终止。基于中期选举中总统所在党往往会失去席位的经验判断以及过去三次国会众议院的“多数—少数”轮替均发生在中期选举的历史事实（即1994年共和党增加54席转为多数、2006年民主党增加32席转为多数、2010年共和党增加64席转为多数），民主党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存在较大可能增加足够席位（24席或以上），进而重新回到国会众议院多数地位。特别是，在2016年大选中，23位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所在选区的选民在总统选举层面上支持了希拉里·克林顿，¹ 为民主党的翻盘提供了更大概率。一旦共和党在国会两院的多数地位被打破，民主党也就将获得足够制约特朗普政策推进的能力和空间。需要强调的是，“两党政治”或“党争政治”的回归，仅仅改变了“党内政治”作为优先主题的地位，但并不意味着两党各自党内长期整合过程的尘埃落定。

至少在2018年中期选举之前，“党内政治”的主题可以被视为判断美国政治大方向特别是特朗普政府稳定性的“唯一标尺”。一方面，如果特朗普可以有效保持共和党阵营的民意支撑、保持国会两院共和党领导层等党内主流派或“建制派”的充分支持、避免出现党内支持的塌方式逆转，所谓“通俄门”等危机都基本上可以保持在可控范围之内，远远不会发酵到开启弹劾程序的地步。另一方面，只有确保共和党党内主流派或“建制派”对其政策议程的支持，特朗普才能彻底实现某些政策绩效，进而兑现竞选承诺。特朗普作为共和党总统的承诺兑现或执政业绩，也将有助于拉抬共和党在国会中期选举中的选情。

（二）长期主题：“周期更迭”下的政治重组

如在前文论及的那样，在整个2016年选举期间，关于美国“政治周期”的

1 Kyle Kondik, "House 2018: Crossover Appeal", *Sabato's Crystal Ball*, Feb 9, 2017, available at: <http://www.centerforpolitics.org/crystalball/articles/house-2018-crossover-appeal/>, 2017年6月3日访问。

论断以及“政党重组”“区域主义”等相关分析框架被反复提及，甚至被视为选前预判以及选后分析大选结果以及美国未来政治走向的重要视角。¹

就政党重组而言，出现这种情况的前提是导致政党基本选民盘重大变化的所谓“关键性选举”（critical election）。从2016年总统选举两党党内初选竞争甚至是金融危机以来两党在某些核心议题上的政策调整上观察，至少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长期充当两党政治划界标准的所谓“社会议题”正在急速弱化，而“如何应对全球化挑战”这一“发展议题”开始占据核心地位。换言之，党争的核心议题正在加剧地经历从“国内议题”转为“应对国际趋势挑战”的所谓“外部化”。这里的“社会议题”基本上涵盖了与意识形态价值观相关的诸多所谓“文化”事务，如同性婚姻、堕胎、性别平等，以及社会福利事务，等等。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在这些议题上的迥异立场不但充当着区分民主、共和两党的鲜明标签，也是两党进行差异性选民动员的抓手，客观上还掩盖了两党党内在经贸、移民等“发展议题”上的隐形分歧。

产生这种议题“外部化”调整的原因复杂，其中最为突出者有二。其一，众多社会议题本质上具有代际属性，其争议性随着世代更替而弱化。最为典型的例子即美国公众对同性婚姻逐渐宽容的态度变化。2001年的民调显示，支持同性婚姻者在民主党、共和党以及独立选民群体中分别为43%、21%以及43%，而在2016年的民调中这三个数字分别提升为70%、33%以及61%。²可见，围绕社会议题展开的所谓“文化战争”（culture war）在烈度上持续下降。其二，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美国的确更多面临着全球化带来的自由贸易与移民流动等多重严峻挑战，而两党在这些重大民意关切议题上原本存在的“党内”和“党间”分歧被放大为主要矛盾，进而形成了全球主义者与本土主义者之间的所谓“边境战争”（border war）。³

“战争”主题转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两党基本选民群体以及政策偏好的同步变化。民主党内部原本存在的“新民主党人”与“进步民主党人”在经济发展议题上的差距日益突出。民主党面对着在前者的不遗余力地发展经济的全球主义倾向和后者的保护本土劳工利益的本土主义倾向之间的重大抉择。2016年总统选举民主党初选对于“新民主党人”的选择，进一步导致了蓝领中下层群体的分化甚至转投共和党。相关民调显示，在民主党受访者中对自由贸易协定的支持者与反

1 谢韬：《从大选看美国的历史周期、政党重组和区域主义》，《美国研究》，2012年第4期，第30—45页。

2 “Changing Attitudes on Gay Marriage”, *Pew Research Center*, May 12, 2016, available at: <http://www.pewforum.org/2016/05/12/changing-attitudes-on-gay-marriage/>, 2017年6月7日访问。

3 Michael Lind, “This is What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litics Looks Like”, *Politico*, May 22, 2016, available at: <http://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6/05/2016-election-realignment-partisan-political-party-policy-democrats-republicans-politics-213909>, 2017年6月7日访问。

对者分别为56%和38%，而这组数字在共和党受访者中为38%和53%。¹ 这就意味着，民主党正在呈现出拥抱全球主义的趋势，也就导致了其在新周期中彻底失去蓝领中下层群体选票的很大可能。特别是在民主党在移民问题上坚持开放态度的前提下，蓝领中下层白人获奖者更为快速地倒向共和党。如果这一趋势得以延续，民主党的选民基础将在新的历史周期中转化为以上层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白人、少数族裔以及城市人口组成的具有全球主义或多元主义倾向的群体。

蓝领中下层群体走向共和党的基本动力，其实是共同分享的传统价值观；但至少在2016年共和党特别是其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也提出了在经济议题上同样吸引蓝领中下层的“美国优先”“让美国再强大”等本土主义解决方案。如果这些经济政策理念得以完善并在特朗普任内获得收效、进而被共和党主流派彻底接纳的话，共和党就将不断将蓝领中下层特别是白人群体巩固为其重要基本盘。换言之，“特朗普时代”之后的共和党极可能将成为以蓝领中下层白人与南方以及农村地区保守派共处为选民基础的本土主义政党。

需要强调的是，基于民主党由不同利益群体构成而共和党由不同理念驱动的大判断，² 与民主党党内其他群体存在利益差异的蓝领中下层可能更易发生政党归属意义上的移动，而逐渐失去蓝领中下层的民主党也将更易整合其他群体的利益；但是共和党相比而言却更难很快在不同理念之间形成能够满足蓝领中下层群体诉求的政策方案与政治立场。这就意味着，因特朗普而回归的本土主义倾向虽然已再次成为了共和党未来的一个重要选项，但也同样是共和党党内不同理念或派别的攻击目标。换言之，这一轮政党重组可能会贯穿特朗普整个四年任期。

就区域主义而言，通常各区域各州在政党归属上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在新周期开启、政党重组出现时，政党区域分布通常也将相伴出现规模较大且周期较长的调整。比如20世纪60年代以来南方从民主党转向共和党的过程。2014年中期选举之后，来自南方各州的所有民主党籍国会议员已无白人，进而南方各州彻底完成了这一轮共和党化。³

结合2016年选举以来的政治现实，美国当前正在同步经历着两个区域的整合。正如前文提及的那样，一个是被认为决定了2016年大选结果的所谓“锈蚀带”。该区域范围内的宾夕法尼亚（20张选举人团票）、威斯康星（10）以及密歇根（16）三州正是在多个民调中被预测倾向于民主党、但最终却为特朗普锁定

1 “Views on Economy, Government Services, Trade”, *Pew Research Center*, March 31, 2016, available at: <http://www.people-press.org/2016/03/31/3-views-on-economy-government-services-trade/>, 2017年6月7日访问。

2 Matt Grossmann and David A. Hopkins, *Asymmetric Politics: Ideological Republicans and Group Interest Democrats*,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3.

3 Jason Zengerle, “The Death of the Southern White Democrat Hurts African-Americans the Most”, *New Republic*, November 9, 2014, available at: <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120212/john-barrows-2014-midterm-loss-end-white-southern-democrats>, 2017年6月7日访问。

胜局的关键三州。这个区域原本是民主党占据某些相对优势的摇摆地带，但自金融危机以来逐渐在摇摆状态得以保持的前提下出现了倒向共和党的端倪。当然，催化“锈蚀带”变动的最大动力无疑是在该地区人口比例中占据举足轻重地位的蓝领中下层白人群体逐渐倒向共和党的选民变化。¹ 而由于共和党党内不同理念整合重构的难度与耗时持久，“锈蚀带”的变动也大概率地要经历一个漫长且方向不定的过程，在两党之间的摇摆或将成为强于某一党明确倾向的区域特征。

另一个是自21世纪初以来就被认为最有可能引发下一轮重大重组的区域，即横贯南北的落基山区八州。这一区域在近年来的变化的确符合当前民主党党内整合的新趋势：以南部墨西哥移民拥入为主动力的少数族裔比例激增；该地区白人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以及蓝领工人比例的骤降；西海岸高科技产业及人口的内迁；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导致人口向城市地区的聚集，等等。² 也正是因为这些符合民主党受教育程度高的白人、少数族裔以及城市人口的新构成，该区域范围内的内华达、科罗拉多、新墨西哥乃至亚利桑那等州也已在不同程度上在总统选举层次成为关键摇摆州。³ 不过，由于落基山区人口规模仍旧较小，其政治影响力无法与南方各州或“锈蚀带”相提并论，因而也只能作为可能引领未来某个周期变革的潜在积蓄因素来持续关注。

概括而言，“政党重组”与“区域调整”的核心都是蓝领中下层尤其是其中白人群体的变动，只是前者是在政党归属意义上的，后者是因为该地区内的群体变动政党归属而导致了区域在政治倾向上的整体移动。这就意味着，民主、共和两党未来也将在与蓝领中下层白人群体密切相关的内外议题上进行重大的政策调整。

四、简短的结语

2016年美国大选与其说是一次竞选和投票过程，不如说更像是一场席卷全美、由心怀变革与“反建制派”情绪的白人蓝领中下层在社交媒体动员下实现的社会运动。“反建制派”候选人特朗普为共和党提供了吸引蓝领中下层这一关键选民群体的“本土主义”理念，进而成功地顺应了2016年大选的整体趋势。“建制派”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无论在政策立场还是个人特质上都已不适合本次选举的特定环境，最终因无力扭转民主党在蓝领中下层群体及“锈蚀带”地区的颓

1 [美] J. D. 万斯：《乡下人的悲歌》，刘晓同、庄逸抒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81—187页。

2 Ruy A. Teixeira, *America's New Swing Region: Changing Politics and Demographics in the Mountain West*,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2, pp. 1-10.

3 Sean Quinn, "The Mountain West: America's New Swing Region", *FiveThirtyEight*, Dec 10, 2008, available at: <http://fivethirtyeight.com/features/mountain-west-americas-new-swing-region/>, 2017年6月7日访问。

势而落败。

特朗普胜选，是美国选民对传统精英提出的解决方案的彻底否定。

不可否认，特朗普及共和党的胜利，远非美国选民为当前美国面临的内外困难寻求到的最佳解决方案，而是选民对传统精英提出的解决方案的彻底否定，也是他们对非传统精英方案的“赌性”期待。这就意味着，对特朗普而言，胜选只是他迈出的第一步，能否兑现承诺、切实解决问题，才是接踵而至的更大考验。如果无法实现诺言，他要么很快被“建制派”精英同化，要么只能通过不断的极端动员来维持部分但却足够的民意支持，实施社会运动般的执政。

可以预见，特朗普的当选预示着美国政党政治新一轮漫长重组的开始，也将美国再度抛入以阶层与族裔意义上的抗争为主题的社会运动的多发期与易发期。但无论如何，特朗普极可能并非切实变革的起点，而是民怨情绪的下一个目标，美国政治进而也将步入充斥着冲突与不确定性的自我调整阶段。

抑或可以这样说：以国家挑战为起点，以新历史周期开启为节点，构成了美国政治发展的新的历史片段。而特朗普的当选、所谓“特朗普现象”的出现以及“特朗普时代”的不确定性，都是这个特定政治生态发展阶段的组成部分与关键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朗普的当选当然存在偶然性，甚至他的个人特质也正在挑战美国政治的底线，但其中那些反映时代趋势的成分，显然是美国政治进入新一轮变革与重组时不可避免的代价。